

实体经济轻装上阵需出实招实策

叶前

任何时候，实体经济都是一个经济体的基石。离开了实体经济支撑，创新和发展也可能成为无源之水

场已堪称疯狂，实体企业家“不务正业”将大量资金投入楼市，是一个危险信号。此前，日本和美国都曾因房地产泡沫破裂而造成大规模金融动荡，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国务院印发的《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》非常值得关注。方案提出，要经过1—2年努力，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工作取得初步成效，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，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。这给在“寒冬”徘徊的企业家打了一剂强心针，但能否让他们心无旁骛地聚焦主业，关键还看能不能落实，有没有实招。

呵护实体经济，最立竿见影的举措是合理降低企业税费负担。越是经济困难的时候，企业越需要输血，但一些地方只顾眼前利益，不输血反倒狠吸一口的做法，无异于杀鸡取卵。比如，有的地方不按企业经营状况收缴，而是年初就定下税收指标分配

到企业；有的地方搞“回溯收税”，追缴此前几年的税款，突然增加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负担，让企业吃不消；有的地方多年前已不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又开始收起来……这些问题，必须及时清理和规范。

从企业反映来看，最难降也最应该降的是制度性交易成本。全面深化改革以来，国务院已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约600项。经过多轮简政放权，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所下降，但仍存在两大难题：一是落实中国在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放到基层之后更不规范、不透明；二是部门协同较差，各个职能部门各改各的，常常是单个部门都说改了，便利了，但民众一旦办起事来，依然“你卡着我、我卡着你”。

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关键在于规范权力运行，杜绝权力寻租。实际上，中央为实体经济减负的政策措施一直没有中断，一些地方也出台了不少办法。但问题在于，由于一些职能部门落实到位或故意

设置障碍，不少政策措施都有点像停留在空中的“饼子”，企业看得见却吃不着。从增强示范性和威慑力的角度讲，不妨狠抓一些典型，像曝光违反“八项规定”那样，形成足够声势的舆论压力。

不过，需要指出的是，《方案》要解决的是实体经济的整体成本问题，并非每个企业都能因此长舒一口气。降低实体经济成本，不等于解救每一个企业，它甚至还会加速优胜劣汰的过程。企业要增强盈利能力，关键要靠自身的努力。剔除了不合理成本，企业能轻装上阵，但要走稳走好，关键在于自身的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。也就是说，实体经济得到了关键的“拉一把”，更要“苦练内功”。

任何时候，实体经济都是一个经济体的基石。离开了实体经济支撑，创新和发展也可能成为无源之水。事实证明，很多核心技术的突破也是在实体行业中取得的，而一些创业“风口”，归根结底也是实体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催生的新机遇。随着降成本组合拳持续发力 and 更加精准，政策的溢出效应还会引起全社会对实体经济的呵护。我们期待，各级政府能持续出实招、硬招，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、助推企业转型升级，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，为实体经济注入更多动能。



东莞曾是“世界制造工厂”，但由于企业利润下降、用工成本提高、工厂租金上涨，仅去年一年就有4000余家企业关门。在制造业“寒冬”之中，不少老板在退出企业经营后都将钱投向了房地产业，不愿再做实业；有些企业家即使拿到银行贷款，也没有再进行实体投资，而是将资金用于炒房。有企业家表示，“很多朋友都放弃了实业投资，炒几套房、炒十几套房赚的利润，比开工厂轻松多了”。

单从个人短期投资的角度考虑，当下“关厂炒楼”是一个很“划算”的选择。一方面，在企业利润不断下探、成本却高企不下的双重挤压下，低端制造和代工类企业正在遭遇“寒冬”，被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所抛弃；另一方面，一线城市的房价不断飙升，有的房子半年就能增值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，很多中小企业老板可能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钱。

但从长远来看，原本做实业的企业家纷纷“转行”炒楼，将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埋下巨大隐患。当前一些城市，房地产市



老乡“改行”

杨三喜

我的老家湖南浏阳是全国有名的花炮之乡，很多家庭都是以做花炮为生。有一些证照不齐全的私人小作坊，甚至直接在家里开工，安全隐患很大。不过，这些年有不少人靠做花炮实现了小康。但最近我打电话回家时听说，邻居中有四五家都买了新车去长沙开“滴滴”专车了。他们中有做了十几年花炮的小作坊老板，也有20岁出头的年轻人。

我记得去年回家的時候，在县城里跟同学聊起“滴滴”“优步”，他们还一脸茫然，很多人从未听过。但一年后，离城市50公里的山村中，竟然有很多人买车去长沙当专车司机，这还真让我感到意外。“滴滴”这一新业态竟然深入到了边远的乡村，取代了很多入曾赖以谋生的职业，科技创新的力量真的太强大了。

花炮之外，我们村以前还有一个“支柱产业”——养猪。大概从1998年开始，村里几家入开了养猪场，十多年来，养猪业不断壮大。虽然行情时好时差，但也成就了好几个百万富翁。养猪让很多家庭致富发财了，但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，以前河水清澈见底鱼虾可寻，如今却散发着刺鼻的恶臭，再也不能下河摸螃蟹了。而河的下游是整个株洲地区的水库，是水源地区。

不过，我最近听说村里以后不能再养猪了。政府准备把水库作为旅游区来开发，要保护环境，要保证水质，上游一概不能养猪了。政府将根据养猪场所的面积，给予养殖户一定的补助。有补助固然好，但是希望不会有什么“限期卖猪令”。没有了养猪业，河水污染的问题算是解决了，养殖户也能得到一笔可能不菲的补助，但他们以后靠什么为生呢？传统的务农是不行的。出去打工也不现实，这些人都已经人到中年，而且没有其他技能。我们村离下游水库还有几十里的距离，以后旅游风景区开发出来了，恐怕也解决了他们的工作。

花炮也越来越难做，有些人转行到了城市开“滴滴”谋生，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跟风。但他们对专车的需求不是永无止境的，开专车的前景也不一定那么乐观。

那么，没有了“支柱产业”，这些人将如何就业，如何谋生？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迫进城，离开农村。当他们都离开家乡之后，村里的环境也许能变好，但可能也会变凋敝。



刷卡如厕

近日，有网友爆料称昆明卫生职业学院规定学生上厕所需刷卡，每张卡内有3吨水的额度，刷过后厕所不能冲水，必须充值。此外，夜晚熄灯、白天停电后，厕所也不能冲水。面对质疑，该学院有关负责人回应称此举是为了防止浪费水。

漫画：李宏宇

防止浪费水，管用的办法有很多，但学校选了最糟糕的一种。只求节约用水有成效，不管学生生活是否便利，说明管理智慧有待提升。

本栏编辑：易艳刚



治电信诈骗先规范个人信息采集

本报评论员刘晶瑶

临沂准大学生徐玉玉用生命的代价，唤起了全社会对电信诈骗问题的重视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，以往大家不以为然的骚扰电话、诈骗电话背后，存在一条牵涉人数众多、涉案金额巨大的黑色利益链，并吞噬了很多人的财富甚至生命。

当前，电信诈骗日益呈现出精准化、职业化的特征。从受骗对象看，大多为老年人、学生等防范意识相对较弱的群体；从作案手段来看，各种陷阱设计得越来越隐蔽，诈骗工具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，不少人将诈骗当成了一种职业——南方某省就因“十个××九个骗，还有一个在锻炼”而被贴上了“电信诈骗之乡”的标签。

如何让骗子无计可施？有人建议进一步推进电信实名制，加强对虚拟电信运营商的监管；有人建议抽调公安精锐警力，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对电信诈骗一律刑事立案；还有人建议民众提高防范意识，增强与骗子“斗智斗勇”的能力；也有人建议从银

行端入手，加强对陌生账号转款的监管，采用技术手段提高止损能力。

其实，电信诈骗的精准度和成功率不断提高，症结在于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防线不断失守。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，面对虎视眈眈的黑客、等待贩卖牟利的信息贩子，如果缺乏严格的保护和追责机制，公民信息就会处于“裸奔”的状态。

进入网络互联互通的时代，收集个人信息的机构日渐增多。网络购物时，只要浏览过某一件商品，下次网站就会自动推送相关类别的商品；查阅新闻时，只要点击过某一起事件，客户端就会记录下你的“喜好”，自动推荐相关的新闻。大到买房买车、办理银行业务，小到餐厅就餐、医院就诊、报教育辅导班，都涉及个人信息的记录与读取。然而，正因为获取信息太随意，保护个人信息的难度非常大。事实表明，很多关键的用户信息，恰恰是通过看上去相对正规的机构泄露出去的。

对于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机构而言，应当建立惩处条款，从立法层面让其承担

起保护个人信息的义务。无论公民信息泄露程度严重与否，都应当追根溯源，找到泄露信息的责任人。刑法修正案(九)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有关条款，并将犯罪主体扩大到一般主体，而不仅局限于刑法规定的国家机关、金融、电信、交通、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。可见，任何泄露个人信息的单位和个人，都可能受到法律的追究。

而从掌握公民信息机构的角度来看，应当建立权责对等的机制，确保用户信息的安全，不去触碰法律的底线。在收集用户信息的时候，要建立必要的边界，不随意跨界，明确非必要性的用户信息采集，只会加重有关机构在履行责任时的风险。

此外，收集用户信息的机构，有必要建立起完善的风险防御机制，如果自身并不具备保护用户信息安全的能力，就应当将泄露的风险提前告知用户。从采集环节入手治理，加重信息收集机构身上肩负的保护义务，严格落实有关方面的监管职责，方能从根本上保卫个人信息安全。

外卖竞价排名会重蹈百度覆辙吗

董建国

外卖平台竞价排名机制不该是法外之地，必须依法按规实施，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

机制，本质上是经济利益使然。这可以让外卖平台在收取商家服务费和正常的交易抽成之外，还能获得一笔不菲的优质广告位推介费，直接增加外卖平台的利润，这是外卖企业对竞价排名乐此不疲的根源所在。

外卖平台要赚取更多的利润，外卖商家要宣传自己，本身无可厚非。但是，外卖平台推行竞价排名机制不能没有规矩。而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调查中，一些商家交足钱就能在外卖平台上获得好位置，甚至一些连经营许可证都没有的“黑作坊”花了钱就能买进前几名。如此，外卖平台事实上成为“黑作坊”的保护伞和同盟军。比如媒体多次曝光过，一些被查处的“黑作坊”改头换面后转战外卖平台，利用竞价排名等方式重新蒙骗顾客。

排名在公众观念里应当是与品质与服

务质量挂钩的，而如今的排名榜名次却是价高者得，可以说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，明显欺骗了消费者。竞价排名模式下，企业和商家各取所需，看似受害者只是广大消费者，但实质上企业和商家丢掉了消费者的信任，可谓得不偿失。

此外，竞价排名还会误导消费，产生劣币驱赶良币的效果。在短期内，竞价排名确实会提升订餐平台的市场份额和“黑作坊”的营业利润；但从长远看来，这无异于是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放纵和对“黑作坊”的听之任之。最终损害的除了顾客的利益，还会造成平台本身的用户流失。

作为第一把关人，外卖平台理应为“黑作坊”的出现承担相关责任。数据显示，2016年第一季度外卖市场整体交易额达200多亿元。与外卖市场发展迅速形

成反差的，是不断断出的外卖平台的餐饮安全问题。外卖平台对餐饮安全不重视，不仅影响了用户的用餐体验乃至健康问题，也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。

外卖平台竞价排名机制不该是法外之地，必须依法按规实施，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。根据《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服务的付费搜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竞价排名，已明确被定性为商业广告。那么，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外卖平台的竞价排名。只要商家是花钱提升排名的，外卖平台就该明确标示出这是商业广告或商业推广，而不是让用户误把靠花钱排名靠前的商家当成有口碑、服务优质的商家。这是外卖平台竞价排名机制当坚守的最基本的底线原则。

相反，如果外卖平台不区分竞价排名结果和自然搜索结果，不具有可识别性，给用户造成误导，实质上属于一种违法行为，应当依照广告法相关规定给予处罚。对此，相关管理部门对于外卖平台的竞价排名机制应该立案调查，如果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，就该依法处罚，并督促整改，不能任由外卖平台任性利用竞价排名机制误导、坑害消费者。

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公布《竞技体育“十三五”规划》(以下简称《规划》)，明确“十三五”期间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和改革方向。纵观《规划》，为国争光仍然是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。不过，《规划》提出的改革创新、有效转变发展方式等目标，意味着竞技体育发展不能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而应有力带动群众体育发展、促进健康中国建设，为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强大中国力量。

里约奥运会刚刚结束，中国体育健儿尤其是中国女排的表现展示了强大正能量和“人生能有几回搏”的奋斗精神，成为新时代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。在这样背景下发布的《规划》，将贯彻实施《奥运争光计划纲要(2011-2020年)》作为第一个主要任务，是对竞技体育正面精神的肯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奥运争光不等同于奥运争金，同样是反对“唯金牌论”。竞技体育的目标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，是既“敢于争先、敢于争第一”，又能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。无论在赛场上取得了怎样的成绩，只要勇于战胜自我、超越自我，都值得尊敬和表扬，都是为国争光，都能成为“中国榜样”。这既是体育的精神本质，同样是中国在深化改革道路上最需要的精神。

在争光计划之外，《规划》提出要改革创新，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，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，要进一步转变职能，深化单项体育协会改革，管办分离，提高公共服务能力。同时以足球改革为突破口，实施足、篮、排三大球发展行动计划，探索中国特色职业体育发展道路，促进体育产业发展，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，初步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、符合世界竞技体育发展趋势、更加开放、更具活力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，弘扬中华体育精神，丰富体育文化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从《规划》中可以看出，竞技体育在提倡为国争光的同时，正在努力扭转一个认识误区——即一段时间以来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、全民健身相对立的误区。

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，也是综合国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。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是体育的双翼，二者实际上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作用。一方面竞技体育展现的拼搏精神和榜样力量能促进更多人、更多孩子参与体育运动，促进全民健身，提高全民健康，弘扬民族精神；另一方面有了全民参与，各个体育项目才有充足的群众基础和后备力量，为竞技体育源源不输输送高水平人才。

显然，关起门来孤立发展对竞技体育来说是行不通的。要发挥竞技体育的强大力量，需要有关部门真正吃透《规划》，准确把握竞技体育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，让竞技体育成为中国体育事业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巨大助力。

新华社南京9月1日体育专电

■好望角

欧美的带薪休假账

徐剑梅

50年前，欧洲人比美国人辛苦，工作时间更长，闲暇时间更少；但现在，情形正好相反，美国人工作时间比欧洲人长，甚至超过了日本人。很多人觉得欧洲人更讲究生活乐趣，而美国人更重视挣钱，没那么多闲情逸致。

在美国，人们外出度假通常最多一周，像欧洲人那样空城而出、长期不归的情况很少。数据显示，美国打工族平均带薪年假仅为欧洲人一半，就这样每年还半数以上的人没休满。年轻妈妈刚生孩子没几天就上班，儿女请假期照顾老人被扣薪水，休假时仍在处理工作邮件，都是常见现象。

美国人这样勤奋，有两个重要原因：一是美国企业炒员工鱿鱼，要比欧洲容易得多，打工族不敢懈怠，很多人担心休假影响工作进度和职场竞争；二是美国是唯一没有全国性带薪休假法律的发达国家，无薪休假仅覆盖美国就业市场不足六成的全职员工家庭假和病假。在休假问题上，美国公认是“最落后的发达国家”。

这就使得美欧休假文化大不相同。在美国人观念里，休假不是权利而是福利，不是政府保障的普遍福利而是企业自行决定的奖励性福利。政府和公共部门带薪年假还算有保障，但私营部门员工带薪年假有无、时长、用途、假期薪资等，都是老板说了算。

这样一来，在带薪年假安排上，美国公司花样百出，既考虑员工需要，也会设法“打折”。常见的做法是规定员工累积带薪年假最高天数，多攒的归零。还有很多公司利用经济补偿鼓励员工放弃休假，或设定休假优先权避免员工集中中休假。如果资历浅，请假晚，很可能有假休不成，过期一样作废。

这些制度安排，导致美国人体休行“零敲碎打”——根据个人需要把带薪年假分成多次使用。不仅如此，对很多美国人来说，休假不等于休息，更不等于旅游，而首先是事假、病假、产假、探亲假。在美国，越是政府机构和大公司，休假福利越好，因此带薪年假可谓“贫富悬殊”。有钱、有能力休国家法定无薪假期的人，往往能享受更多的带薪假；没钱、没能力请无薪假的人，享受带薪年假的机会越少、时间也越短。美国智库“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”的调查显示，逾半数底层低收入工人没有带薪年假。

今年赶上大选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·克林顿已承诺，当选后将保障最高12周带薪年假和病假，供员工照料新生儿或重病家人；员工本人重病或受伤可获最高12周带薪年假用于康复；休假期间可拿最低三分之二薪资。钱从哪来？她表示不但增加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开支，也不因此增加工薪家庭税务负担，而是通过税收改革，“让最富裕阶层公平分担”，具体方案尚付诸阙如。

希拉里的承诺，不仅基于民主党增加福利的传统，也因为把带薪年假视为重振中产的政策工具。希拉里竞选团队宣称，推行带薪年假以支持工薪家庭，“不是一种奢侈，而是一种经济需要”。在民主党阵营看来，重振中产需帮助他们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，保障带薪年假乃是重要条件。

美国近年两党政治极化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迄今未提及带薪年假问题。对带薪年假制度，最常见的反对理由是会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增加，从而削弱企业竞争力和赢利水平。更有学者研究指出，欧洲人享受到的充裕带薪年假，是欧洲企业雇工成本高昂、企业雇佣意愿下降的原因之一，而后者又是欧洲失业率更高、社会流动程度更低的重要推手。

美国的两党制衡体系，使得带薪年假的举措往往只能裹着小脚再迈小步。但如前所言，在美国，有钱人不愁假，无缘带薪年假的主要是底层低收入者，因此，带薪年假制度要算经济账，但不能只算经济账，需把保护弱势群体和维护社会公平纳入考量。而从国家层面，带薪年假设计需考虑企业、社会和政府支出成本和承受能力，需要在促进社会公平和保持经济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。

对普通大众的打工族来说，带薪年假当然越多越好。但老话说，常将无日思无日，饱时常记饿时饥。不管在哪个国家，福利能够增，却很难减，易产生比附效应。调整幅度宜小不宜大，不宜追求一次到位，也未必需要中央统一。

不仅如此，有些福利指标，达到世界先进不见得是好事。从带薪年假到医保、美国福利指标远逊欧洲，多年来“自甘落后”，而在创新活力上却全力争先。以中国国情和国力，福利制度恐怕学不了美国，更学不起欧洲。如何设计有中国特色、有前瞻性和弹性的休假制度，值得更多思考。



据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报道，如今一些外卖平台通过竞价排名的方式，向平台商家收取费用，帮助交钱多的商家提高排名、增加曝光率，一些无证经营的“黑作坊”也能靠钱买到好位次。(详细报道见9月1日5版)从这一点看，被视为外卖平台新吸金术的竞价排名，很容易成为“黑作坊”的保护伞，严重危害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如果处理得不好，可能会重蹈百度竞价排名的覆辙。

随着互联网的普及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百度外卖、美团等外卖平台点餐。在无法掌握实体店真实情况时，消费者都是通过APP内的排名以及销量等进行选择。因此，在外卖行业里，排名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
对于互联网领域的竞价排名机制，公众并不陌生。如今一些外卖平台采取竞价排名

让竞技体育真正『融入』体育

新华社记者王恒志